

偶像崇拜的六十年变迁

在我们的经历中,有很多东西也许是终生难忘的,比如偶像。我相信,每个人都曾与自己的偶像相伴,走过一段人生旅程。即使你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把自我和个人的精神自由看得比命还重要,你也不会没有所崇拜的对象。有人会说,我不崇拜任何人,我只崇拜我自己,就像“五四”时期的那句名言:我是我自己的。犹如自我解放的宣言,它宣告了孤独个体与专制制度的势不两立。但残酷而荒谬的不仅是专制制度对个体生命的虐杀,还包括每个个体在面对自身意义的空白和自身所指的匮乏时所产生的惊慌失措。我是我自己的,但我又是谁?自己又是什么?如果这个终极问题得不到答案,那么,我们刚刚获得的主体性也就不具有真实的含义。

很多时候,我们恰恰是从偶像身上找到自身意义的。英雄崇拜,偶像崇拜,既是源自个人内心的心理需求,又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社会需求。

因此,不仅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偶像,而且,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偶像,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还会有不同的偶像。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偶像大约就是小兵张嘎、《鸡毛信》里的海娃,或《红孩子》里的儿童团员,崇拜的人物还有李向阳、史更新、肖飞、马英或者杨子荣、许云峰、成岗、江姐、铁道游击队等等,他们的英雄传奇在我的童年时代曾是一道绚丽的风景,也是我们乐于模仿,甚至梦中仍然念念不忘的内容。如果说这些偶像只是投射了一个孩子的英雄情结的话,那么,另有一些英雄模范人物,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欧阳

海、刘英俊、王铁人、王国福等,则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并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道德理想的标杆。所以,那时并不用偶像一词,比较多的还是直接称为英雄、模范、典型或榜样。“学习雷锋好榜样”,歌里就是这么唱的;还有一句老生常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种对于榜样的推崇和迷信,与偶像崇拜或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一样,区别就在于,偶像崇拜更多地基于个人的心理诉求,而榜样的确立,却只能来自特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持。

发生在70年代以后的变化,首先还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的主要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知识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于是,知识分子成为人们追捧的新的偶像,陈景润和钱锺书分别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领域。人们崇拜他们,其实是在崇拜知识。这里或许仍然体现了一种国家政治意志,只不过是单纯的道德完人,变成了知识积累的神话,作为偶像崇拜,它还是被动的,单一的。当然并不排除有人崇拜张海迪或女排的姑娘们,她们在民众中唤起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还有人崇拜温罗克和张志新,他们的行为,标志着人类可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其实,不管你叫他什么,偶像也好,英雄也罢,榜样也行,都是社会价值理想的体现者。你崇拜一个人,就意味着你认同他的理想和价值观,向往他的精神境界,希望成为他那样的人物。这样的崇拜,更多的还是一种理想情怀。

随着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社会渐露雏形。利

益的多元,带来了价值的多元;价值的多元更带来文化的多元。特别是大众流行文化的兴起,明星制的引进,商业价值获得广泛认同,偶像崇拜正在变成一种消费形式。虽然有人发现了顾准、陈寅恪这样的精神崇拜对象,但已经很难进入社会的主流。事实上,这个时代的偶像崇拜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就像几十年前的偶像崇拜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政治烙印一样。一方面商人、老板、企业家成了一些人崇拜的偶像,另一方面,文化商人和掮客则试图将一切偶像崇拜都转化为商业价值。在这里,不仅演艺明星被发现了具有商业潜力,甚至像杨利伟这样的航天英雄,都无法逃脱被消费的命运。前几年我去阿根廷,恰赶上切·格瓦拉的纪念日,满街都是他的头像,印在各种旅游商品上。这时的偶像崇拜,已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多元崇拜的特征。如果说大众的消费活动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偶像明星的话,那么,对明星的偶像崇拜,又进一步转化为商业利润。

纵观60年来偶像的变迁,在中国,我们的偶像崇拜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具有政治诉求的偶像崇拜转变为商业的、世俗的、大众情人式的偶像崇拜;再一个就是偶像崇拜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当下几乎不再可能出现在全民崇拜的唯一偶像。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进步,没有人能够阻挡其步伐。但其吊诡之处就在于,这种进步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而是使人陷入了新的奴役。也就是说,对象不再向它的崇拜者贡献意义,而是使他的生活丧失意义;偶像崇拜者为了解脱孤独和寂寞而崇拜偶像,这时才发现,他可能因此陷入更深的孤独寂寞之中。

摘自《论坛》

袁隆平的“财富观”

日前有人给“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算了“身价”,据称高达1000亿元。对此袁隆平先生表示:“用财富衡量科学家价值太低级、太庸俗。”袁隆平先生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在小片试验田里已经取得亩产900公斤的佳绩,他曾经自豪地说,

如果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到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则每年可以多养活4亿人。

面对如此伟大的成就,用得上那句套话: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好事者为袁隆平先生“作价”,大概就是这种慷慨之意的“量化”表

达。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这种用“身价”表达敬意的方式,已经成为许多人唯一擅长和理解的语言。在他们的评价标准里,最伟大、最杰出、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应该是最“贵”的人,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标准可以用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和价值。

袁隆平先生的“不领情”,既是对这些人的棒喝,也是对社会的提醒,人们应该在金钱之外发现更珍贵的价值。

摘自《北京青年报》

13岁的硕士生

2005年,他以10岁的年龄,成为“最小的大学生”。在许多人预言又一场现代版“伤仲永”即将上演的时候,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向“最小硕士研究生”的跨越。

“居高临下的感觉真好”

办入学手续时,张妍炆遇见了他未来的导师,两个月前,双方已经见过面。母亲示意儿子“快叫老师”,结果他连招呼都没打,扭头走了,只留下一句话:“都认识了还说什么,以后有的是机会”。

类似的情形,在2005年张妍炆考入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时就曾上演过。第一次见面,学校的老师让他写几个字看看,这个还差一个月才满10岁的大一新生写了10个字:“居高临下的感觉真好啊。”从一开始,张妍炆就直呼两位导师的名字,“既然知道名字,不叫白不叫”。

和所有早慧的孩子一样,张妍炆最先表现出来的还是学业上的天赋。有一次上课,别的同学都在认真听,这小子突然鼓起掌来,说是因为看到了“多项式对称的美,情不自禁”。导师张跃辉为此感到震惊:“我确实表达对数学美的感受,但此前从未有过共鸣。”另一个故事则反映了张妍炆非凡的记忆力,大一下学期,他完全凭心算解出一道八元二次方程。

为弥补因为年幼而欠缺的叙述能力,导师刘华曾要求张妍炆用500个字描述自己的办公室。半个钟头后,他发现纸上只写了一行字——“废纸堆上漂浮着几张桌子”。刘华发现,张妍炆能敏感地发现事物的核心所在,这个少年所具备的天分他前所未见。刘华经常带着他去公园,张妍炆会因为某片树叶的脉络

结构很漂亮,呆坐下来,盯着看上半个钟头。这种“专注”,被认为是数学研究或其他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先天素质。

可另一方面,这个10岁的少年也像许多同龄人一样,无法在课堂上认真听课超过10分钟。每隔几分钟,这个坐不住的学生就会用油彩笔在同学的衣服上作画,或是悄悄地把女同学的头发绑在椅背上。这个好动的少年很轻易地与他比他大8岁的同学交朋友,还在班上认了4个姐姐,“我喜欢跟她们一块儿玩,她们很漂亮”。

“有比我更牛的人吗”

12岁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同学贾艳的印象里,“一个暑假过去,这个弟弟突然就和我们就远了”。很明显,张妍炆在大学迎来了青春期。那时他每顿饭要吃4个馒头或6两米饭,学会了自己打水洗脸刷牙,讲话瓮声瓮气,身高也很快从1.43米逼近到1.70米,开始像男子汉一样锻炼身体。

此时的张妍炆倔强而自信,从打算算账或投机取巧。如果一道选择题不会做,他宁愿空着也不蒙答案。不过,他也会因为参加一期访谈节目,在全班同学面前露了脸而得意洋洋一个月。

“张老师,你说,现在这个班还有比我更牛的人吗?”考上研究生之后,张妍炆有一次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忽然问张跃辉。

“这没什么了不起。”张跃辉很平静地回答,“如果每个学生都能拥有两位导师,都被允许提前考研,班里好几位同学完全都可以考上研究生,而且成绩比你你好。”

但打心底,张跃辉也认为自己的这个学生“的确很牛”,只是,“我

必须在他怀疑自己的时候夸奖他,在他翘尾巴的时候打击他。”“骄傲、叛逆、反抗……当人们把他当成一个大学生的時候,会看不惯他的某些言行,并以此说明他不够格。”张跃辉说,“但是说到底,他就是个13岁的孩子。”

“没有他就没有我”

2008年,这个13岁的硕士研究生,与父亲张会祥同住在北京大学的一间博士生宿舍里。

“父亲和你比谁更优秀?”有人问张妍炆,“也许我更优秀。”张妍炆回答说,“但是没有他就没有我。”

在张妍炆两岁识字、5岁上小学、9岁上高三、10岁上大学的传奇经历中,父亲张会祥始终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张会祥河北科技大学毕业,在发现儿子的早慧之后,他萌生了从“超慢式”教育中突围的想法,继而总结出一套“量化为先”、“求博不求尖”的教育理念。

2005年,张会祥和妻子把家从辽宁盘锦迁到河北廊坊,专职“陪读”。张妍炆向学校申请不上英语课,改由父亲指导自己复习。在“英语靠死记硬背”的思想指导下,他通过了英语四级和六级。

有评论认为,这种陪读的模式不可复制,而现在的成绩,只是将应试教育发挥到了极致。可在张会祥看来,讨论这些根本没有任何意义,13岁的张妍炆走上的是单行道,只能这么走下去,而自己的任务就是确保张妍炆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张妍炆会把“菲尔茨奖”(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项)挂在嘴上,可张会祥为儿子设计的路只是考硕、考博,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是每个家长的想法,我们只是提前了几年。”张会祥说。

许多人都担心,总有一天,张妍炆将不得不脱离对父亲的依赖,独自面对世界,到那时,他怎么办?

摘自《启迪》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 zzwzbwb1616@sina.com

钱学森与夫人蒋英：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在中国科学院宿舍区一排老道的红砖楼群中,有一座普通的小楼,这就是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夫妇的家。

悠悠青梅竹马情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都是前清秀才,又同是留日学生,两人回国后都在北京供职,因此两家来往甚密。

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只有一个独生子的钱均夫仗着同蒋百里的特殊关系,直截了当地提出要5岁的蒋英到钱家做他的闺女,蒋英的名字也改为钱学英。

蒋英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过了一段时间,我爸爸妈妈醒悟过来了,非常舍不得我,跟钱家说想把老三要回去。钱学森妈妈答应放我回去,但得做个交易:你们这个老三,现在是我干女儿,将来得给我当儿媳。”

蒋英儿时喜爱唱歌,颇有音乐天赋。1937年,蒋英考入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从此开始了她在欧洲学习音乐的漫长旅程。

而钱学森,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对艺术也很热爱。书法、绘画、写作,小品尽显才艺。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钱学森和导师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一个在美国苦攻航空机械理论,

一个在欧洲畅游于声乐艺术的海洋之中,10多个年头,钱学森与蒋英彼此没有来往,只有艺术的种子孕育在各自的心田。然而,当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把蒋英在欧洲的留影拿给钱学森看时,照片上那动人的微笑和儿时依稀可见的美丽,在钱学森的心里掀起了波澜。

这年的旧历七月初七,是钱学森刻意选择的良辰吉日。钱学森来到蒋家,走到蒋英面前恳切地说:“英妹,12年了,我们天各一方,只身在异国他乡,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多么需要在一起,互相提携,互相安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要相逢,我们却一别12年,太残酷了。这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去,你答应吗?”

1947年,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喜结良缘。

这年9月26日,钱学森与蒋英赴美国波士顿。他们先在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租了一座旧楼房。在新的起居室里摆了一架黑色大三角钢琴,为这个家平添了几分典雅气氛。这架钢琴是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礼物。

在软禁中相濡以沫

在美国工作的10多年间,钱学森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8月,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海軍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

整整5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

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支竹笛,蒋英弹一把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虽然说竹笛和吉他的声音并不那么和谐,但这声音是钱学森夫妇情感的共鸣,它是一种力量,它代表了这对不屈的夫妇的一种意志,一种品格,他们从这音乐中领悟到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心和动力。

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

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美国政府终于准许钱学森夫妇回国。但当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他们6岁的儿子永刚、5岁的女儿永真在机场最后登机时,美国政府又无理扣留、没收了钱学森在美国20多年间积累下的研究笔记。而他们的结婚“信物”——黑色三角钢琴,在蒋英的据理力争下,最终与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国。这架三角钢琴也因此成为钱学森和蒋英历经风雨、沐浴幸福的见证。

在回国以后的40多年里,每当蒋英登台演出,或指挥学生毕业演出时,她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钱学森也喜欢把所认识的科技人员请来欣赏,大家同乐。有时钱学森工作忙,蒋英就录制下来,放给他听。如果有好的交响乐队演奏会,蒋英也总是拉钱学森一起去听,把这位科学家、“火箭迷”带到音乐艺术的海洋里。

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钱老总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于是,他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福气啊!他甚至总想对人们高呼一声:让科学与艺术联姻吧,那将会创造奇迹!

摘自《新华网》

来。这份档案的保管形式是——纸张卷曲后塞在一根铁管中,这根铁管在两头被焊死后藏进了墙壁里,秘不示人。

一本胡乔木在“文革”时期的“起居录”,记录了胡乔木每天起居、活动、来电等。这是警卫人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记录在一本小黑皮本中的。因为有一回周总理要找胡乔木,却不知道被拉到哪里批斗了,于是指示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要对胡乔木每日行踪加以记录。叶永烈费周折借到手后,一口气全部予以复印。

摘自《报刊文摘》

姜昆与姜威手足情深

2009年1月25日,农历大年三十。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刚下春节联欢晚会,就迫不及待地与弟弟姜威通了电话,他关切地问:“感觉身体好些了吗?我这段时间忙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和演出,一直没去看你,实在抱歉啊。”电话那端,姜威无语哽咽。

生死相依

2002年10月底,姜威陪姜昆去江苏昆山演出。一向身体健朗的姜威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姜昆关切地说:“这里离上海近,你去上海做个全面体检吧。”检查结果诊断为肾癌。

当天晚上,姜昆给姜威打了个电话,故作轻松地说:“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你的肾上长了结石,医生说还是及时做手术为好。”姜威敏感地问:“一个肾结石必须要手术吗?是不是我得了别的病?”姜昆急忙说:“你别瞎猜。我问过医生了,肾结石如果发展严重了,很有可能癌变,咱们听专家的没错。有大哥在,你什么也不用怕。”

1950年11月19日,姜昆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是小学语文老师,母亲在街道工厂工作。姜昆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比姜昆小7岁的姜威是最小的弟弟,

姜昆对他格外疼爱。17岁那年,姜昆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当时,家里经济条件很差,姜昆在兵团每月有32元的工资,他只留下几块钱,剩下的全都寄回家。

姜昆成了全国著名笑星,但他与姊妹们的感情却没有生疏。1983年,姜威要结婚,姜昆帮弟弟布置新房,找人打家具,安排婚宴的事宜。结婚那天,姜昆更是忙前忙后地招待着亲朋好友。姜威的儿子高中毕业后准备去新加坡留学。姜昆拿出一张写了一串名字的纸交给侄子说:“这是我在新加坡所有朋友的联系方式,你有困难可以找他们。”

1998年,姜昆决定创办鲲鹏网。网站初建需要2000万元资金,姜昆为了筹钱,把自己的房子、车子、电脑等全卖了,一家三口搬到姜威家去借住。看大哥倾其所有,姜威毅然辞掉贸易公司的工作,全身心地来帮助大哥。

击退病魔

姜昆和姜威商量后,决定到上海去做手术。姜昆在陪着姜威做了术前的全面检查后,才把真相告诉姜威。

当天晚上,姜昆请专家们吃饭,拜托他们一定要对弟弟多加关

名流故事

照。听专家说喜欢自己的相声,姜昆就在饭桌上给大家说相声,搞了一场两个多小时的“个人专场”演出。

11月8日上午,姜昆一直拉着姜威的手,将他送到手术室门外。手术成功后,因为没有度过危险期,姜昆不放心,晚上坚持要留在医院。半夜,姜威醒了,看到实在熬不住的大哥侧着脸,趴在床边睡着了。后来,姜昆怕弟弟再有事而自己睡着了,就找来一根细绳,一端拴在弟弟的手腕上,一端拴在自己的手腕上。为了照顾姜威,姜昆推掉了不少演出,在医院整整照顾了姜威10天。

风雨携手

一个多月后,医生告诉姜昆,姜威可以出院了。当时姜昆正在外地演出,便打电话让妻子亲自去上海接姜威。姜昆还特意打电话向医生咨询,肾摘除手术后应该注意什么,并一一记在本子上,经常打电话提醒弟弟。

姜威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姜昆便鼓励他出外旅游。他知道弟弟几年没工作了,经济上肯定不富裕。于是,就经常塞给他装有钱的信封。在姜昆的鼓励下,姜威经常和妻子出去旅游,在亲近大自然的過程中,姜威的身体真的一天天好起来。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张大千艺惊陈半丁

上世纪30年代的一天,北平城里的十余名画家举行雅集。在宴会上,年龄最大、名望最高的大画家陈半丁老人兴奋地宣布:他新近得到清初著名画家石涛和尚的一部画册精品,为此他特地邀请北平艺苑名流第二天晚6点到他家鉴赏。陈半丁邀请很多画苑名流,却少邀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当时正客居北平、尚无名气的年轻画家张大千。

但张大千是个有名的“石涛迷”。他少年习画,就下工夫临摹石涛、八大山人、徐渭和吴昌硕的画,研习多年,画技几可乱真,有“南方石涛”之称。这次,他风闻艺林有此佳集,鉴赏石涛精品,此等机会他岂能放过?因而不等陈半丁相邀,第二天下午3点张大千就直趋陈府求见,毫不客气地当面向陈半丁要求

出示藏画。陈对张大千这位虎头猴脑的后生小子摆架子说:“我约朋友来共赏,请帖的时间是晚上6点。”说完,离座而去,留下张大千一人在客厅里坐冷板凳。

年青的张大千受到如此冷落,也是老大不高兴。但为了鉴赏石涛的稀世珍品,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等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晚上6点多,贵客齐集后,陈半丁先在宴席上讲了一通开场白,自称率获名迹,不敢私密自珍,愿与好友共赏。张大千被挤在这批名流的外圈,等陈半丁捧出宝贝画册,刚刚展示,张大千就不由自主地大声叫起来:“是这个册子啊,不用看了,我晓得!”陈半丁被这个年轻人的狂妄急躁弄得很生气,于是他学着张大千的四川口音说:“你晓得,你晓得啥子嘛?”陈半

丁想,我画册还未全打开,你怎么晓得?

但这时张大千却不慌不忙地讲出,此画册第一页画的是什么,第二页画的是什么,题的什么款,用的什么印章,如数家珍,一一道来。陈半丁与众画家一边听张大千讲,一边翻看画册,进行核对,发现张大千竟说得丝毫不差。陈半丁与众画家万份惊奇,陈在翻看时连眼镜都滑落到了地上。画家黄君璧惊异地问张大千:“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张大千的回答更使大家大吃一惊。他得意地说:“这画册是我画的,咋个不晓得?”

原来,这画册是张大千于前临摹石涛画风的习作之一,早已流传失落多年,不知怎么竟辗转落到陈半丁手里。张大千临摹之精,画艺水平之高,竟瞒过了一代国画大师前辈陈半丁之眼。于是,张大千从此在画界名声大振。

摘自《团结报》